

# 启示与思考

——由陕西三位作家的创作所引发的

韩鲁华, 韩保刚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陕西 西安 710055)

**摘要:**从地域生态文化视域,并放在当代中国文学整体,对陕西作家的创作进行审视来看,以路遥、陈忠实、贾平凹为标志的陕西作家,以其创作实绩,在当代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深深的一笔。他们对于当代文学的启示在于:作家的文学创作,要深植于他所生存的环境、故土的地域文化;始终关注现实,坚守平民立场与情怀;坚守艺术精神和纯艺术的道路;对于人文立场与良知的坚守。

**关键词:**地域生态文化; 陕西作家; 当代中国文学; 文学启示

中图分类号: B 26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7192(2011)03-0043-10

## Inspiration and Thinking

——On the literature of three well-known writers from Shaanxi

HAN Lu-hua, HAN Bao-gang

(Xi'an Univ. of Arch. & Tech., Xi'an 710055,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perspective of a regional ecological culture sited in a context of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as a whole, the paper reviews the literary creation of Shaanxi writers and finds out that their works represented chiefly by Lu Yao, Chen Zhongshi, Jia Pingwa left a deep stroke in the history of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Their inspiration for the contemporary literary is that the writer's literary creation should be deeply rooted in his native living context of rich regional culture, and should always be concerned about the reality, and the stance and feelings of common people. It is important for writers to adhere to the spirit of literature and stick to the road of art for art's sake with the consistency of humanity and conscience.

**Key words:** regional ecological culture; Shaanxi writers;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literary inspiration

这一问题的提出,是基于这样的思考:从地域生态文化理论视野,在对陕西作家路遥、陈忠

实、贾平凹的文学创作进行研究,我们花费了很大的精力,对这三位作家的文学创作所做的分析

收稿日期:2010-11-03

基金项目:陕西省社科基金项目(10K123);陕西省高校特色学科建设项目陕西省生态文明建设研究(E10001)

作者简介:韩鲁华(1955-),男,山东鄄城人,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现当代文学与文化。

探讨,究竟是为了什么?难道仅仅是为了说明这三位作家的创作是什么吗?我们对于已有文学创作的探讨研究,都不仅仅是为了说明是什么,而更重要的是为了从中探寻看有什么值得借鉴的东西,给文学创作能够提供什么的思考。当然,能够给人们提供启示思考的并不一定都是成功的文学创作经验,他们在文学创作上所走过的弯路,或者所存在的某种遗憾,都是具有启示或者警示作用和意义的。那么,陕西这三位作家的文学创作,究竟能够给我们当下的文学创作,提供些什么有启示的东西呢?

## 一、作家的创作必须根植于自己的地域文化之中

陕西这三位作家文学创作实践,首先为人们提供的借鉴启示在于:作家的文学创作,是离不开他所生存的环境,尤其是生成他们文学创作文化思想的故土,以及存活于故土的地域文化。有一种观点说,愈是地域的就愈是世界的。路遥、陈忠实、贾平凹陕西这三位作家似乎用他们的文学创作实践,再次佐证了这一观点。

人的文化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在他出生的时候,便已经打上了地域性的底色。而能够使他与其他地域区别开来的,仍然是地域性。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我们常提到的一个话题就是,中国的当代文学与世界文学之间存在着差距。在探析原因时,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当代中国作家缺乏世界尤其是西方作家那种艺术素养和思想境界。的确如此。我们不会忘记1980年代作家们在短短的10年左右,将西方的各种文学艺术都学了一遍,但是,就是到了今天,我们依然未能创作出超越西方艺术水准和思想境界的

作品。于是又提出了文学创作本土化、民族化的问题。这中间的问题是十分复杂的。但是我们不能忽视这么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是与西方化的民族文化,在思想观念、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等诸多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不管我们如何向西方学习,可能艺术技巧

性的东西,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内便能够学到手,但是,文化思想则是短时期所难以改变的。五四以来,甚至可以说近代以来,我们便开始学习西方,但直至今日,我们的基本文学艺术思维方式与艺术创作行为方式,并没有发生质的变化。我们依然是我们。这究竟是为了什么?我们中华民族文化思想及其文化心理结构,就决定了我们不可能成为西方式的。外在的力量会对人的文化思想及其文化心理等产生作用,但是,不可能发生彻底地更本性的改变。这正如一句歌词说的那样:洋装穿在我的身,可我依然是中国心。这个心不仅仅是对于祖国的眷恋,还应当是中国式的文化思想与精神心理。

也许正因为如此,陕西这三位作家,并非拒绝西方的艺术思想,而是坚守自己的地域文化思想,在此基础上吸收借鉴。但是,中国式的艺术思维并未发生本质性变化。反而在自己故土地域文化中浸润,坚守自己地域文化的特色,走出了自己的文学创作道路。

坚守自己文学创作的地域性特色,首先是以融汇着自己生命情感的地域生活作为写作对象。虽不能绝对说作家创作只有以自己生命情感所寄寓的故乡地域,方能取得成功。但从已有的文学史实来看,在艺术创造上取得成功,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原因,那就是将文学创作深深地根植于故土的生活,故土的文化之中。就中国现代以来的文学创作而言,鲁迅的小说创作,基于故土绍兴,沈从文最具特色也被人们最为称道的,则是对于熔铸着人性美、人情美与自然美德湘西地域生活的刻绘。巴金的《家》在四川成都,老舍的创作基地在北京,还有所谓的乡土文学诸作家,以及沙汀、赵树理等等。就是张爱玲,那也是以上海为其创作的基本对象的。当代的孙犁、柳青、周立波,以及新时期以来的诸多作家,基本是如此。从陕西这三位作家的创作实践来看,路遥是以陕北为其创作基地,陈忠实离不开关中地区,贾平凹似乎以商洛故土和西安为其创作对象,但是贾平凹最具特色的创作依然是对于故土商洛的叙述。

这里必须谈到一个问题,那就是将文学创作

对象的生活视域拓展的更为广大的问题。这一方面,作家都有着不同程度的探索,但是我们不得不说,离开他们最为熟知的地域,就容易走向理念化,出现一种“隔”的现象。陈忠实的《白鹿原》虽然生活背景是中国20世纪上半叶社会历史生活,但是审视的基点则是白鹿原及其关中地域。贾平凹主要是商州,西安与其说是对于城市生活的拓展,不如说是对于商州生活的拓展。路遥文学创作最为动人、叙写最为精彩的依然是陕北。《平凡的世界》作为一种社会宏大叙事艺术建构,其视野是非常宽阔的,正如研究者所说的那样,是一种全景式叙事。但是,从艺术叙事的精美而言,我们不能不说,路遥的城市叙事并不成功,甚至是一种败笔。对于城市生活的叙事,处于表面化、观念化,并不能如他对于陕北生活的叙事,字里行间都熔铸着生命情感。反之,陕北地域生活在他的笔下焕发着艺术的熠熠光彩。这也正应了一句老话:不要写自己并不熟知的生活。

不仅如此,他们用自己的创作实践,还在发展着这一观点,那就是超越地域的,更是民族的乃至世界的。这似乎与上述叙写自己熟知的地域生活相矛盾。其实不然。我们于此所说的超越地域的更是世界的,是从作家审视创作对象的社会历史视野、文化思想境界与精神情怀角度谈问题的。即写作对象自然是自己熟知的地域生活,但是审视对象的视野则不能局限于地域,而应当从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向,从人类文化精神建构,从人生命本体等方面来审视自己的创作对象,使地域性对象,具有着人类整体性的意义。这就是既立足于地域,而又超越地域性,走向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学创作。就此而言,我们说陕西这三位作家都做着努力,其文学创作具有着对于地域的超越性。但是,不仅他们三位,就中国当代文学创作来看,仍然存在着某种局限性,最为主要的问题是对于当代社会缺乏一种历史的穿透力,对于民族的超越性。或者说,我们的文学创作总是在本国度里打转转。尤其是对于当下性、意识形态性的超越,依然是我们文学创作需要突破的一个瓶颈。通过对这三位作家文学创

作的分析,为我们的文学创作提出了进一步发展提高的问题,那就是如何将地域性、民族性与世界性融为一体,于地域生活的叙事中,融汇民族的社会历史内涵,具有人类生存的普遍审美价值。就如《百年孤独》、《尤利西斯》等作品那样,于地域性民族化的基础上,开掘出世界性的文学主题。

## 二、始终关注现实,关注下层社会,关注平民的生活状况和生存状态,坚守平民立场与情怀

这是他们文学创作上又一共同的特点,也是所提供给人们的又一启示。

关注现实,是当代文学创作的一个传统。从1949年以来,不论何种体裁的文学创作,都是关注现实社会生活的。或者说,对于社会现实生活叙事的文学创作,成为当代文学创作的主体。一方面,陕西作家从老一辈那里承续了这一创作传统;另一方面,正如贾平凹所言,他们的生存境遇,决定了他们必然要关注现实生活。他们紧紧地将自己的艺术之笔,胶着于社会现实生活。接下来的问题是,关注现实的什么。很显然,以这三位作家代表,陕西作家在对于现实生活关注时,首先关注下层社会现实生活,关注平民阶层的现实生存状态,他们始终坚持着平民的写作立场与情愫。路遥是为现实生活而写作,他的创作可以说始终关注普通人的生活与生存,他所这里叙述的也是陕北最为普通的农民。陈忠实的创作,《白鹿原》之前亦是如此,紧紧地跟随现实生活,可以说社会现实生活,尤其是乡村现实生活,每一点变化,都在他的作品中有所表现。《白鹿原》作为一部历史文化小说,自然对于中国的社会历史进行了艺术叙事,但是,其间依然熔铸着作家的现实生活的感受,用他的话讲,就是生命情感的体验。这种体验自然有着历史的、文化的体验,但是我们认为,更有着现实的生命情感体验。贾平凹的文学创作,是从对于现实生活美好情愫的叙事开始的,后来虽然创作审美风格上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对于现实的关注,则是

贯穿整个创作历程的。其间穿插着对于商州历史文化的探寻,也有着如《五魁》等商州现代民间历史生活的叙述,但基本创作视域仍然是集中在现实生活。

更进一步的问题是如何关注现实。如果说关注现实是体现的写什么,那么,如何关注就是怎么写的问题。就这三位作家来说,他们都在怎么写的问题上进行了苦苦的探索,都在寻求者最为适合自己的现实叙事方式。路遥始终坚持社会现实生活宏大叙事的创作之路,重在探寻人生的价值和意义,通过人生命运的揭示,来进而探寻中国当代社会现实的发展命运。《平凡的世界》与《人生》等作品相比,在怎么写上有了一定的发展变化,路遥将这部百余万字的遑遑大作,基本叙事确定为全方位地展示中国当代社会现实生活的发展变化,但着力展示的依然是人物的人生命运与生存状态。而且,在对社会现实生活的剖析过程中,显现出明显的社会意识形态化的特征。这也是路遥创作中从不回避,并且致力践行的。也正是在这些方面,得到了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充分肯定,但也受到了非主流意识形态文学创作与批评者的质疑和批评。坦率地讲,这既是成就路遥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原因,亦是局限路遥不能走向更为深刻、更为广阔审美艺术境界的一个重要因素。

陈忠实早期的文学创作,毫无疑问应属社会意识形态化的艺术叙事。在陕西乃至全国的当代作家中,陈忠实的生活基础是非常扎实的。对于社会现实生活,特别是乡村生活的了解和积累,那是非常丰富深厚的。可以说,陈忠实本身就生活于乡村现实生活之中。他对于乡村生活的体验,对于其细节的描绘,可以说是非常深入和准确的。但是,正如他自己所言,如果他不能超越他所憧憬的文学导师柳青,他将不可能走出自己的艺术道路,不可能建构起文学艺术的自我。正因为于他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清醒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方对自己此前的文学创作进行了一次彻底反思。去意识形态化写作是他迈开的第一步。从历史文化来反观社会现实,从自己真实的生活与生命体验来建构现实生活叙事艺术

形态,使他走向了今天的能够扛起当代中国现实主义创作,主要是历史文化现实主义创作大旗的陈忠实。《康家小院》、《蓝袍先生》是现实生活叙事,《白鹿原》虽然是一种历史文化叙事,但是其间所涌动的现实生活情感则是显而易见的。所以,《白鹿原》既是一种历史文化现实叙事,亦是一种现实生活叙事。这二者的有机融合,构成了陈忠实现实叙事的基本艺术叙事形态。

在怎么写上,贾平凹是当代中国文学创作上最为用力的一个。可以说在一开始,贾平凹就在怎么写上显示出自己的特异之处。《满月儿》的成功,并不在于对于现实生活的叙述,而在于以有别于当时文学叙事模态的叙事视野。这篇小说对于现实生活美好情愫的开掘与叙述,为人们提供了别一种艺术叙事风貌。《“厦屋婆”悼文》等一批作品,是贾平凹自觉地进行现实叙事艺术探索的收获,虽然因批评界武断干预而中断,创作了《腊月·正月》意识形态的作品,但是此前所进行的现实叙事艺术探索的体悟,在这些作品的叙事艺术中,仍然有着体现。如果说贾平凹前期创作对于现实生活关注,更多是从美好情愫角度切入的,那么,从《五魁》等开始,特别是《废都》这部现代知识分子生命情感与文化精神的作品,就更多揭示了现实生活与现实人生存状态的悲剧性与困惑性、尴尬性,甚至荒谬性。《秦腔》、《高兴》等作品,对于现实生活与现实生存状态的思考,在我们看来,依然承续着贾平凹这种叙事特色。也正是在这一层面上,贾平凹对于现实的艺术叙事,与西方文学在文化精神上更为接近。

固守自己的文学创作阵地,坚守自己的文学创作的艺术原则,强化自己的文学创作审美个性。在前面的论述中,我们已经明确地阐明,作家必须坚守自己的写作阵地,写自己最为熟悉的生活,否则,就会出现力不从心,出现艺术创作上的某种尴尬局面。故此,关于固守自己的文学创作阵地问题,这里就不再展开论说。

对于作家来说,都有自己文学创作的艺术原则,都形成了自己的文学创作艺术审美个性。就中国当代文学创作而言,所形成的最为基本的创作艺术原则,就是所谓的现实主义原则。直至今

天,主流意识形态或者社会体制,依然将现实主义文学创作,视为正统或者主导性文学创作。就文学创作起步来看,包括路遥、陈忠实、贾平凹在内的新时期作家,可以说都是从现实主义创作起步的。之后,他们形成了各自的文学创作艺术审美个性,沿着自己的艺术方向不断发展,使自己的艺术审美个性,得以丰富和完善。

就坚守自己的文学艺术原则而言,陕西这三位作家可以说都是一以贯之的。从新时期以来文学创作发展历史来看,出现过几次具有全国性影响的变化,一次是1980年代中期出现的所谓先锋文学创作,此时西方现代文学艺术、文化思想超用到中国,冲击着当时的文学创作,有不少作家纷纷将文学艺术创作的目光,投向了西方。再一次就是1990年代兴起的大众化、通俗化、世俗化,甚至是庸俗化文学创作浪潮。路遥、陈忠实、贾平凹不能说未受冲击,也不能他们为进行思考。但是,他们最终是坚守了自己的文学创作原则,而未被这些浪潮所卷裹。

比较而言,路遥在文学创作艺术原则上,始终坚持的是以柳青为标志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路遥在完成《人生》创作之后,面临着如何发展的问题。他对自己进行了认真思考,在他看来,现实主义更适合于自己,因此,他在《平凡的世界》创作中,坚持了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原则。路遥在后来总结《平凡的世界》创作体会经验的《早晨从中午开始》,对于自己为何坚守现实主义文学创作,进行了阐述说明。路遥在《平凡的世界》创作准备时,他面临着巨大的新的文学创作浪潮压力。“各种文学的新思潮席卷了全国”,他下一步的文学创作,自然要面对抉择:是投入文学创作新思潮之中,还是坚守自己在《人生》等作品创作中所形成的创作原则。“但理智却清醒地提出警示:不能轻易地被一种文学风潮席卷而去”<sup>[1]13,15</sup>,必须坚守自己的艺术阵地。在路遥看来,“在现有的历史范畴和以后相当长的时代里,现实主义仍然会有蓬勃的生命力。生活和艺术已证明并将继续证明这一点,而不在于某种存有偏见的理论妄下断语。即就是有一天现实主义真的‘过时’,更伟大的‘主义’莅临我们的头顶,现实主义

作为一定历史范畴的文学现象,它的辉煌也是永远的”<sup>[1]18</sup>。路遥这一断语并非一时情绪化情境下作出的判断,而是经过了深入的思考所得出的结论。正如他说:“我并不排斥现代派作品,我十分留心阅读和思考现实主义以外的各种流派。其间许多大师的作品我十分崇敬。我的精神常如火如荼地沉浸于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卡夫卡开始直至欧美及伟大的拉丁美洲当代文学之中,他们都极其深刻地影响了我。当然,我承认,眼下,也许列夫·托尔斯泰、巴尔扎克、司汤达、曹雪芹等现实主义大师对我的影响要更大些”<sup>[1]15</sup>。也就是说,在路遥看来,现实主义文学创作更适合他。于此,路遥给我们的启示是,坚守自己的创作原则,哪怕是其他人再怎么花样翻新,或者出现再新颖的文学创作方式,都要坚持自己的艺术追求,守住自己的艺术之根不能变。在自己文学艺术之地基上,建造自己的艺术大厦。但这并排斥对于其它文学艺术流派艺术思维方法的吸收,将其它文学艺术因质融入自己的基本创作模式之中,使之更为丰富。

如果说路遥是含纳式的现实主义创作,那么,陈忠实则是开放式的现实主义创作。陈忠实在与李星的对话中,明确表示《白鹿原》依然坚持的是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他说:“在我看来,不可能一夜之间从现实主义跳到现代主义的宇航器上。但我对自己所遵循的现实主义原则,起码可以说已经不再完全忠诚。我觉得现实主义原有的模式或范本不应该框死后来的作家。现实主义必须发展,以一种新的叙事形式来展示作家所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和现实内容,或者说独特的生命体验。”“但无论如何,我的《白鹿原》书仍然属于现实主义范畴,现实主义者也应该放开艺术视野,博采各种流派之长,创造出色彩斑斓的现实主义;现实主义者更应该放宽胸襟,容纳各种风貌的现实主义”<sup>[2]33,35</sup>。陈忠实在这里阐述了这么几层意思。第一,他仍然坚持着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他不可能彻底摆脱现实主义而成为其它什么主义的创作,也不可能走向现代主义或者后现代主义;第二,现实主义不死僵死的,而应当是发展的现实主义,要发展就必须吸纳新的艺术素

养,含纳百川地从其他文学创作流派中吸收优秀的艺术营养;第三,他的现实主义,已经不是原来的现实主义,他对于中国当代现实主义创作原则,进行了超越、创新,走向了一种属于他自己的新的现实主义。陈忠实文学创作在艺术上发生嬗变,是从对于他的文学导师柳青的反思与超越开始的。他说“在我小说创作的初始阶段,许多读者认为我的创作有柳青味儿,我那时以此为荣耀,因为柳青在当代文学上是一个公认的高峰。到80年代中期我的艺术思维十分活跃,这种活跃思维的直接结果,就是必须摆脱老师柳青,摆脱得越早越能取得主动,摆脱得越彻底越能完全自立。”因为“一个在艺术上亦步亦趋地跟着别人走的人永远走不出自己的风姿,永远不能形成独立的艺术个性,永远走不出被崇拜者的巨大阴影”<sup>[2]34</sup>。陕西乃至全国许多作家,在走向文学艺术殿堂的时候,都受到了柳青的影响,而路遥、陈忠实尤甚。至今路遥、陈忠实他们这一代作家,仍然对柳青保持着崇敬乃至崇拜的心理。以柳青为标志的当代现实主义,应当说属于社会政治意识形态化的现实主义。路遥、陈忠实走出自己的文学艺术创作之路,均是从对柳青的超越开始的。比较而言,路遥就是在《平凡的世界》的创作上,依然更多地坚守了柳青式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与柳青具有着本质性的内在艺术血肉联系。陈忠实则对柳青进行了更多的艺术超越,可以说,《白鹿原》依稀可以看到柳青的些微影响,但是于整体艺术模态创构上,则更多地受到马尔克斯、肖霍洛夫、谢尔顿等世界文学大师影响。正是从世界文学大师那里汲取了艺术营养,并与他所要表现的艺术对象相融合,才有了今天陈忠实历史文化现实主义创作。陈忠实文学创作实践,给予人们的启示,与路遥有相似之处,那就是必须坚守自己基本的艺术创作原则,在此基础上,吸纳其它文学创作艺术的优秀因质。但是也有差异,陈忠实是在原来的地基上,推倒重建一种更能体现自己艺术风格、艺术个性的艺术叙事模态。

贾平凹的文学创作,有一种说法就是多变。其实,贾平凹的文学创作是有变更有坚守。贾平凹文学创作艺术,从一开始就试图走另外一条路

子。笔者把贾平凹称之为主体精神表现型作家,就是强调他所走的不是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传统的路子,自然也不是典型的现实主义创作路子。他的变,首要的是对于当代文学艺术传统的变革,他想从中国古代文学艺术传统中汲取营养,承续废名、沈从文的文学创作艺术传统,在此基础上,建构起自己的文学艺术世界。甚至可以说,贾平凹是当代中国文学艺术传统的叛逆者。也许正因为如此,他的文学创作,常常受到当代文学传统坚守者的批评,乃至指责。但是,三十多年一路走下来,贾平凹并未因为受到批评,而改变自己的艺术追求,更为改变自己的艺术操守。贾平凹文学艺术创作的原则就是,与不断求新求变中,坚守自己基本的艺术创造追求。贾平凹是从另外一种方式,持之以恒地坚守自己的文学创作原则。任谁都会看出《满月儿》与《废都》及其以后作品之间所存在的巨大差异。比较而言,贾平凹在文学艺术上找到自己的归宿要比路遥等远一些,其主要原因在于贾平凹相对于中国当代文学传统,要另开炉灶,探索的时间势必要长一些。于1980年代中期,贾平凹基本确定了自己文学创作发展方向之后,于整体艺术建构模态上,并未发生质的变化,而是一直沿着这种路径走下去。于文学艺术建构上,追求整体性、多义性、混沌性、模糊性;在文学创作上,“河床是本民族的,流的却是现代的水,起的是现代的浪花,”“一定要有现代的东西,但也要一定写出中国人的味道来。”这可以说是贾平凹自1980年代初期始,所一直坚持的文学创作原则。于此贾平凹与同行的形式学西方,思想文化坚守中国的观点不同,他主张“在境界上一定要借鉴西方的东西,在行文表现上一定要有中国的作派”<sup>[3]22</sup>。至于究竟是写了一段故事,还是一堆鸡零狗碎的泼烦日子,则是作品的具体叙事方式问题,自有其不同和变化,但是基本的中国作派与现代文化思想意识,是贯穿如一的。

### 三、对于艺术精神的坚守,始终如一地走纯艺术的道路

对于作家来讲,文学创作的艺术文化精神操

守,可能比艺术创造更为重要。尤其是对于像我们的论述对象这几位在文学创作上具有着文学史意义价值的作家,更是如此。这也是路遥、陈忠实、贾平凹以自己的文学创作实践,所坚守的一种精神情怀。坦率地讲,这三位作家的脾性是各不相同的,审美风格与艺术个性也是差异性非常的大。但是,他们对于文学艺术的崇敬,对于文学艺术创造精神的固守,对于作家艺术精神立场的坚守,则是一致的。从他们文学创作的历史来看,他们对于文学艺术的理解,前后是有着一定发展变化的,他们的文学创作亦如此。比如陈忠实1980年代初期之前,认为文学是生活的一种反映,强调对于生活体验的艺术表现。到了《白鹿原》,他认为文学是一种个人的兴趣。文学创作是生命与艺术的双重体验的展示。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于艺术创造上基本是承续着《人生》的思维模态,但其发展变化还是显而易见的,最少在生活面上有着较大的拓展。如果说《人生》是一种人物人生命运发展叙事模态,那《平凡的世界》则是一种社会生活全景式叙事模态。陈忠实的《白鹿原》不论从哪种角度看,对于他此前的文学创作都是一次脱胎换骨式的飞跃,达到了他可能在无法超越的艺术高度。贾平凹一直是在处于当代文学创作在场状态,他是每一部作品都有一些突破变化。如果说《废都》是他文学创作上一次大的飞跃,那么,《秦腔》则是他《废都》之后多部作品艺术上的一次总结。但是,他们对于文学艺术的精神操守则是始终没有改变。

作家的文学创作,是与作家的文学艺术精神与思想境界紧密相连的。有人讲作家须具备三方面的素养,这就是艺术素养、理论素养和思想素养。这样说似乎对作家有些过于苛刻,但从古今中外文学大家的创作实践来看,确实如此。能够在文学创作上独树一帜,尤其是能够成为一代大家的作家,都是具有自己的艺术观念与审美个性,具有自己的文学创作理论为支撑的,特别是有着自己的思想观念。这一方面在当今文学创作上尤为重要。对于作家来讲,不应以艺术技巧为创作的最终追求。在许多作家那里并不缺技巧,而缺的是文学艺术理论的支撑,更缺少文

化思想作为文学创作的底蕴与升腾的推动力。

记得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一种寻找当代文学大师的风潮,寻求的结果是,包括这三位作家在内的当代作家,都没有被冠以大师的命名,而认为是具有大师品性或者潜质的作家。倒是王一川在编的一本书里,将贾平凹添列在鲁迅、沈从文等大师的行列,但并未得到普遍的认可。在我们看来,重要的并不是包括这三位作家在内,是不是大师,而在于他们的文学创作究竟能给我们这个文学时代,提供那些穿越时空的东西。五四以来中国的文学创作,除了鲁迅、沈从文等几位作家之外,又有多少作家的作品,能够成为经典性的文学创作呢?就是鲁迅、沈从文也不是没有异议。纵观近百年来中国文学,特别是近半个多世纪的中国文学,总觉得存在着难以突破的情结,使得中国文学创作,在世界文学艺术的顶峰前一步停止了。这是令人值得深思的。

1990年代特别是进入新的世纪之后,文学界出现了看起来是两种不同的话语语境:全球化语境和本土化或者民族化语境,实际是一个问题:中国文学如何走向世界,如何取得可以与世界文学平起平坐的地位。全球化语境是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背景下提出来的,或者说是由经济问题引申出来的文化及其文学问题。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问题,在1980年代就有人提了出来,这是中国文学在中国改革开放大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必然要提出的问题,只是没有那么迫切。当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在所谓的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情形下,文学融入世界文学整体构架就显得迫切起来。不可否认,1990年代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中国与世界的文化交流更为密切,文学艺术在国际上的来往,也就更为频繁。但是依然是引进的多输出的少。就对于文学创作来说,不能说没有影响,但成效却是并没有人们想象或者期望的那么明显。不论是自恋式的寻找大师,还是剃头挑子一头热式的走向世界,最终依然是要拿文学创作的实绩来与世界文学对话。人们似乎都感觉到了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之间的差距或者差异,但是,任谁也无法解决这一问题。也许全球化语境与本土化语境下的文学创作,可能

算作是一种走向世界的一种思路吧。

在我们看来,中国文学的问题还是在其本身。我们也承认中国文学在停止与世界文学对话近30年后,重新以开放的姿态与世界文学进行对话,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和发展,但是我们依然是跟在别人的后面,而无法走到别人的前面。

这究竟是因为什么?问题还是要回到文学本身上来。首要恐怕对于文学艺术最为基本的理解,依然存在着问题。文学艺术固然要面对社会,面对生活,面对历史,面对思想文化等等,但是最根本的恐怕还是要面对人,面对人性人情的审美建构问题。作品的深度,取决于作家思想认知的深度,主要是对于人性认知的深度。文学创作上的创新不仅仅是艺术形式问题,更为主要的恐怕还是思想认知上的创新。1980年代出现的文学创作方法热,可谓是热闹非凡,但结果又如何呢?比如许多作家都在学习《尤利西斯》,但是《尤利西斯》创作却是从荷马史诗中得到启发,从中汲取艺术与文化思想营养的。《百年孤独》对当代文学创作的影响亦是很大的,而《百年孤独》是在世界历史文化思想构架上,开掘人类文明历史的现代建构的。就此而言,中国当代作家的文化视野,依然是当下性的中国视野。思想境界与精神情怀不具备人类性,那是创作不出人类性的文学作品的。表面看我们的文学具有着人类性的思想与情怀,但实际上依然是未能超越自己脚下的土地。坦率地讲,我们用我们的社会历史文化与艺术眼光,或者以我们自己的思维方式,对我们脚下这块土地的开掘,已经达到了我们所能达到的深度和广度。但这并不是人类的高度和深广度。

路遥的文学创作,是建立在社会现实之上的,所建构的文学创作艺术模式,是社会现实生活模式。当代文学传统与苏俄文学传统,是其文学创作的主要艺术思想来源。路遥的文学创作对于中国当代社会现实生活的艺术建构,应该说是相当成功的。他也注意到了对于现实中人的关注与揭示。这主要是处于社会历史与人生命运层面,处于现实人生状态层面,而对于人本身,特别是对于人人性深层的思考与开掘,显然不是

路遥文学创作所致力。也就是说,路遥具有着社会现实生活的广度和深度,而没有人性的深度与广度。也许正是在这里,路遥的文学创作,赢得了正处于社会现实奋斗之中的人的更为广泛的认同,而不能取得更多的文化思想界的认同,也必然于此停止了融入世界文学或者人类文学的脚步。

笔者注意到陈忠实曾经写过的一篇关于古罗马妇女贞节带的文章。这一古罗马对于女性人性的戕害,对陈忠实的心灵所产生的震撼,是非常强烈的。这种心灵的震撼,可能在他的《白鹿原》创作中有所体现。古罗马的贞节带与中国的贞节牌坊,有着某种契合。也许陈忠实的这种生命体验,使得《白鹿原》对于生命本体的关注,达到了非常深刻的程度。陈忠实的文学创作,从社会现实生活模态裂变为历史文化模态,使他在艺术上发生了一次飞跃。从文化思想到生命体验,陈忠实对于中国社会现实与历史文化的体悟与认知,达到了别人未能达到的深度。正是这一方面,成就了陈忠实。但是,也正是如此,使得陈忠实因对于中国历史文化浸淫太深,而不能走向更为宽阔的艺术天地。陈忠实的《白鹿原》毫无疑问是民族的,但是,是否就是世界的,我们依然心存疑虑。关键是超越民族的问题。有一种观点说愈是民族的就愈是世界的,在我们看来并不全面,应当再加上一句,那就是超越民族的更是世界的。于此想到李建军对于《白鹿原》关于头发这一细节的分析,问题不在于头发自身,而在于是否超越民族情感而从人类角度去审视半个多世纪前那场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战争。这是一个民族问题,更是一个人类问题。

贾平凹的《废都》重版,给文学界带来了活跃的气氛。对于这部作品有人认为它非常真实地叙写了中国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有人说写出了人类自身生存进入世纪之交的困境等等。从社会现实叙事模态角度来看,贾平凹似乎并未达到当代文学传统视野下的深广度,至今仍然有着贾平凹文学创作社会生活不足的说法。其实,贾平凹虽然从未漠视现实,而是时时关注着现实。但是,作为主体精神表现性作家,他更注重



对于人的生命情感与文化精神的思考与探索。正如前文所说,贾平凹强调在精神境界上要具有现代意识,在艺术表现上要体现中国作派。于此他追求的是在文化精神上与西方的融汇。他曾经说穿过云层都是阳光,言下之意是在生命情感与文化精神上东西方存在着共同之处,是可以相通的,因为我们同属人类。这种认识在当代文学创作上是具有其特异性的。也可以做这样理解,东西方在人的本质上是相通的,但在具体的表现形态上则存在着差异性。对于人及其人性等方面的艺术表现和开掘,《废都》达到了相当的深度,这也是此前所未有的。这部作品很易让人想起《尤利西斯》。这两部作品在艺术叙事作派上,显然是各不相同的,但是对于人类生存困境,对于生命本体的思考,当然也就是对于人自身的思考,二者之间是存在着共性的。但是,我们依然可以感觉到二者的差异性。贾平凹对于人及其人性等的思考,一只脚已经迈进人类境界,而另一只脚却还停留在自己的土地上。

#### 四、对于人文立场与良知的坚守

对于人及其人性和人类历史文化精神建构的反思与批判,是知识分子的基本立场,也应当是文学艺术所要坚持的立场。作家在进行文学创作时,责无旁贷地应坚守最为基本的社会良知和伦理道德。作家这一职业就决定了他与社会现实处于一种对抗的地位,这种对抗并非与社会现实完全的不合作,而是将更多的关注倾向于对于人性之恶与社会之不合理上。他重要的不仅在于扬善,更为重要的是对于一切不合理的东西进行揭示和批判。这实际上是作家对于现实的态度问题,更是作家的一种文化精神操守问题。中国文学创作自1990年代始,对于现实的认同成为一种基本的倾向。不论是世俗化还是娱乐化,其现实反思与批判的力度在不断地削弱着,甚至是在解构着现实力度和深度。有人讲1990年代后中国知识分子进行着全面的溃退,形成了独立人格的缺席,媒介化的所谓知识分子在场化,实际上是一种对于现实的彻底妥协,本质上

是知识分子精神的消解乃至消失。因此,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并不缺乏言说的知识和智慧,而且有着言说的强烈欲望,甚至将欲望最大化乃至泛滥化,而缺乏言说的自主思想和独立精神,更缺乏作为公共空间领域中言说者应有的良知。在这种文化语境下,作家文学创作的基本态度、立场、精神的坚守,就显得尤为重要,因为这决定着文学艺术建构的深厚度与发展的历史趋向。

路遥的文学创作具有着强烈的社会现实参与意识,也有着社会历史反思意识。路遥似乎更为注重一种社会历史的建构,而不是解构。他将更为深入凝重的笔触,伸向了社会生活的机理,对于人性人情也是从社会现实层面进行剖析。也许是路遥对自己笔下故土富有过于深沉而真挚的眷恋与热爱,因此,他的笔端总涌动着一种温情。他不是在做手术刀将疮疤毫不留情地割掉,并且展示给人们看。他是在抚摸伤痛。他对陕北及其生存于此地人和事,赋予了更多的理解和安慰。他也不是逼近人性的深渊,而是深入到社会人生生存境地。因此,路遥对于人性的险恶,也就总是以一种温和的态度审视。路遥的笔凝重但是并不犀利。路遥强悍而刚强之中,常常是蕴含着善意的温情。他不是一位彻底的否定者,而是一个建构者。或者说,路遥不是以一种批判否定的眼光看待这个世界,而是以一种反思与建构的眼光进行审视这个世界。路遥在进行社会现实生活叙事中,往往寻求着和解的路径。在他的笔下,现实不能说不够残酷,甚至也很无奈。但是,残酷的现实世界,也总是充满了善意。高加林背叛了刘巧珍,背叛了这片故土中所生成的良知,但是,当他重新回到这片土地时,这片土地不仅没有嫌弃他,反而深情地接纳了他。对于这片土地宽厚胸怀,人们充满了崇敬。对于现实,对于人性批判的力度,也就在相当程度上被软化了。

陈忠实具有着严峻的目光。对于历史文化的深入剖析与反思以及有保留的批判,和对于生命的深切关注,使得陈忠实走向了深刻。陈忠实那双深邃而犀利的眼睛,包含了更多的沧桑,但更蕴含了严峻与透彻。陈忠实以《白鹿原》为标

志,将中国半个多世纪的社会生活、人及其生存状态,放在了历史文化与生命的平台上进行考量。对于人性的思考与反思批判,陈忠实是历史文化角度进入的。历史文化与心理结构相结合,展示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形态,也就成为陈忠实历史文化叙事建构的一个核心纽结。陈忠实要用自己的笔为中华民族画魂,他认为,“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创作,无论什么流派,现实主义后现实主义新写实派意识流寻根主义以及数量不大的荒诞派,无论艺术形式上有多大差异,但其主旨无一不是为了写出这个民族的灵魂,差异仅仅在于艺术形式的不同。”因此,他“也是想通过自己的笔画出这个民族的灵魂”<sup>[2]28-29</sup>。怎么画呢?我们觉得对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解析,就是陈忠实画魂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艺术方式。他坦言:“我过去遵从塑造性格说,我后来很信服心理结构说;我以为解析透一个人物的文化心理结构而且抓住不放,便会较为准确真实的抓住一个人物的生命轨迹”<sup>[2]27</sup>。事实证明,陈忠实基本实现了自己的艺术创作目标。

如果仅仅如此,那陈忠实似乎并不能超越别人。对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解析,从寻根文学始,已有诸多作家进行了艺术探索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陈忠实另外一把利剑,就是对人生的思考与解析。也恰恰在这里,陈忠实深入到了人性本体建构的深处。陈忠实用冷峻甚至残酷的笔,展示着人性的血性。对于人包括性欲望在内的生命本体中,人性的种种展示,可谓是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中极为少见的。小娥从人性压抑,到充分释放,终归于被残酷地毁灭,那可说是震撼人心的叙述。也正是对于生命对于人性的观照,使得历史文化叙事建构,具有了更为深刻的人性光芒。

不仅在陕西,就是在全国的文学创作上,贾平凹是比较早地对于民族文化及其心理进行探

析的作家。1985年左右出现所谓的寻根文学,其实早在1980年贾平凹就开始了这一方面的探索。我们理解当时整个文学创作的情景,陕西评论界对于贾平凹在这方面的探索所进行的批评,时过境迁,我们也能够充分理解。也许是文学创作艺术思维惯性所致,以《商州初录》等为标志,贾平凹虽然更注重了社会现实生活的叙述,但是,对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解析,却并未止步,而是一以贯之,直至今天,这依然是他艺术建构的重要视角。

如果说贾平凹1980年代之前,是一位美好情愫的歌者,那么,之后他便更多地以批判的眼光来审视这个世界,审视人性及其建构。也正是在对于现实、社会、人生状态、生命情感等等的审视中,形成了他的现实精神与文化批判立场。当然,批判不是贾平凹创作的唯一立场,但是他文学艺术建构中基本的立场。贾平凹反复强调文学作品的多义性建构,强调多视角多层面的艺术审视。不论社会、现实、生活、人生,以及生命情感,当然也是人性的建构,都不是单色的,而是复色的。同样在他的作品中,没有大恶人,也没有大善之人。人都是那么的平常,又是那么的自然,完全是一种混沌状态之人。人与社会、文化等融为一体,苍茫而来,又茫然而去。对于人的审视,他既关注于社会现实生活,又关注于历史文化;既关注于人的生存状态,又关注于人的文化精神建构;既关注于生活本真,又关注于生命本体。尴尬、困顿、焦虑、悲悯,甚至荒诞、虚无,都是贾平凹作品深层所思考的问题。与其说他在叙说社会现实生活,不如说他是在思考人生命存在的现实性、虚妄性与可能性。也许正是在这些方面,贾平凹的文学创作,更接近于人类存在所必须面对和思考的问题,与世界现代文学之间存在着某种精神的通道。

#### 参 考 文 献

- [1]路遥. 早晨从中午开始[M].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3.
- [2]陈忠实. 陈忠实创作申诉[M]. 花城出版社,1996.
- [3]郜元宝,张冉冉. 贾平凹研究资料[M].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